

王強 主編

近代世界史文獻叢編

36



廣陵書社

近代世界史文獻叢編
36



廣陵書社

貴州师范学院内部使用

第三十六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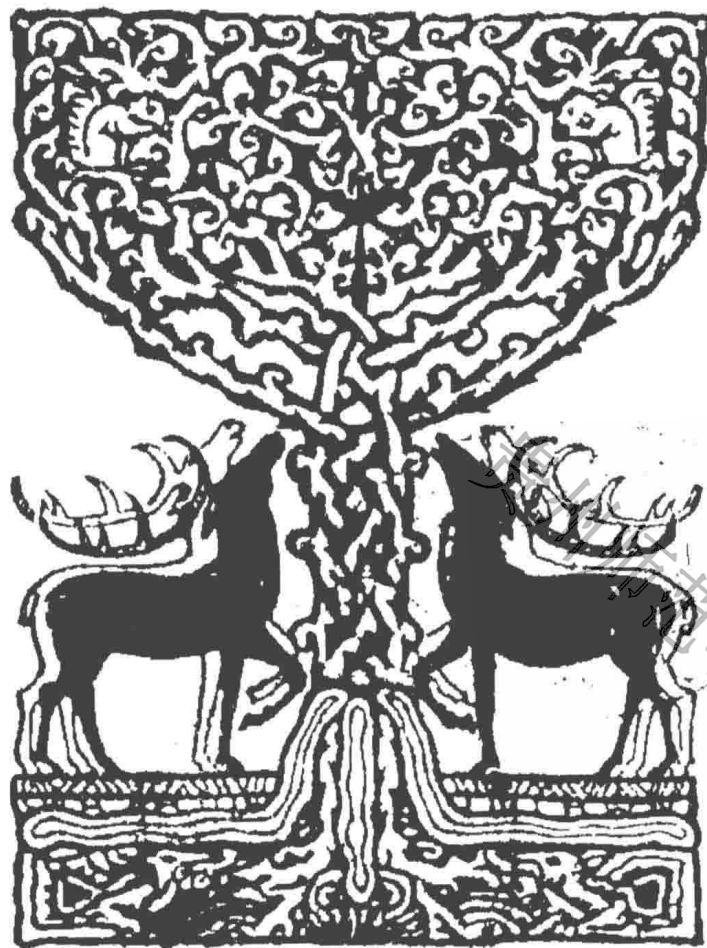
法蘭西史 馮品蘭編 民國三十年 中華書局 一

法蘭西的崩潰與復國 Pierre Maillard 著 石坤琳譯述 民國三十六年 商務印書館 二一七

中華百科叢書

法蘭西史

馬品蘭編



上海中華書局印行

中華百科叢書

馮品蘭編

法蘭西史

中華書局印行

總序

這部叢書發端於十年前，計劃於三年前，中歷徵稿整理排校種種程序至今日方能與讀者相見。在我們，總算是「慎重將事」，趁此發行之始謹將我們「慎重將事」的微意略告讀者。

這部叢書之發行，雖然是由中華書局負全責，但發端卻由於我個人所以敘此書，不得不先述我個人計劃此書的動機。

我自民國六年畢業高等師範而後，服務於中等學校者七八年，在此七八年間無日不與男女青年相處，亦無日不為男女青年的求學問題所擾。我對於此問題感到較重要者有兩方面：第一是在校的青年無適當的課外讀物，第二是無力進校的青年無法自修。

現代的中等學校在形式上有種種設備供給學生應用，有種種教師指導

學生作業，學生身處其中似乎可以「不遑他求」了。可是在現在的中國，所謂中等學校的設備，除去最少數的特殊情形外，大多數都是不完不備的。而個性不同各如其面的中等學生，正是身體精神急劇發展的時候，其求知慾特別增長，課內的種種絕難使之滿足，於是課外閱讀物便成為他們一種重要的需要品。不幸這種需要品又不能求之於一般出版物中。這事實，至少在我個人的經驗是足以證明的。

當我在中等學校任職時，有學生來問我課外應讀什麼書，每感到不能爲他開一張適當的書目，而民國十年主持吳淞中國公學中學部的經驗，更使我深切地感到此問題之急待解決。

在那裏我們曾實驗一種新的教學方法——道爾頓制，此制的主要目的在促進學生自動解決學習上的種種問題，以期個性有充分之發展。可是在設備上我們最感困難者是得不着適合於他們程度的書籍，尤其是得不着適合

於他們程度的有系統的書籍。

我們以經費的限制，不能遍購國內的出版品，爲節省學生的時間計，亦不願遍購國內的出版品，可是我們將全國出版家的目錄搜集齊全，並且親去各書店選擇，結果費去我們十餘人數日的精力，竟得不到幾種真正適合他們閱讀的書籍。我們於失望之餘，曾發憤一時擬爲中等學生編輯一部青年叢書。只惜未及一年，學校發生變動，同志四散，此項叢書至今猶祇無系統地出版數種。此是十年前的往事，然而十餘年來，在我的回憶中卻與當前的新鮮事情無異。

其次，現在中等學生的用費，已不是內地的所謂中產階級的家長所能負擔，而青年的智能與求知慾，卻並不因家境的貧富而有差異，且在職青年之求知慾，更多遠在一般學生之上。卽就我個人的經驗而論，十餘年來，各地青年之來函請求指示自修方法，索開自修書目者，多至不可勝計，我對於他們媿不能

盡指導之責，但對此問題之重要卻不曾一日忽視。

根據上述的種種原因，所以十餘年來，我常常想到編輯一部可以供青年閱讀的叢書，以爲在校中等學生與失學青年之助。

大概是在民國十四五年之間，我曾擬定兩種計劃：一是少年叢書，一是百科叢書，與中華書局陸費伯鴻先生商量，當時他很贊成，立即進行，後以我們忙於他事，無暇及此，遂致擱置。十九年一月我進中華書局，首即再提此事，於是出計劃而徵稿，而排校。至二十年冬，已有數種排出，當付印時，因估量青年需要與平衡科目比率，忽然發現有不甚適合的地方，便又重新支配，已排就者一概拆版改排，遂致遷延至今，始得與讀者相見。

我們發刊此叢書之目的，原爲供中等學生課外閱讀，或失學青年自修研究之用。所以計劃之始，我們即約定專家，分別開示書目，以爲全部叢書各科分量之標準。在編輯通則中，規定了三項要點：即（一）日常習見現象之學理的說

明，（一）取材不與教科書雷同而又能與之相發明，（二）行文生動，易於了解，務期能啓發讀者自動研究之興趣。爲要達到上述目的，第一我們不翻譯外籍，以免直接採用不適國情的材料，致虛耗青年精力，第二約請中等學校教師及從事社會事業的人擔任編輯，期得各本其經驗，針對中等學生及一般青年的需要，以爲取材的標準，指導他們進修的方法。在整理排校方面，我們更知非一人之力所能勝任，乃由本所同人就各人之所長，分別擔任，爲謀讀者便利計，全部百冊，組成一大單元，同時可分爲八類，每類有書八冊至廿四冊，而自成爲一小單元，以便讀者依個人之需要及經濟能力，合購或分購。

此叢書費數年之力，始得出版，是否果能有助於中等學生及一般青年之修業進德，殊不敢必，所謂「身不能至，心嚮往之」而已。望讀者不吝指示，俾得更謀改進，幸甚幸甚。

舒新城 二十二年三月。

自序

我不是專攻歷史的，對於歷史的著述，論理應該「敬謝不敏，」不容「率爾操觚。」但當我研究哲學社會民族學等學科時，仍不絕地受着歷史的刺激，終於引我進入歷史的領域，對歷史由簡單的認識，而引起濃厚的興趣，同時並作粗淺的涉獵。

德國的思想界，嘗好用「文化」一語，但欲研究文化，不能離開歷史。所以在德國許多著述中，文化科學，歷史科學二語，嘗互用並稱。赫特(Herder)著人類史的哲學概念，就想借徑於自然史人類史來研究文化的發達。西南學派對歷史科學（亦稱文化科學）尤有精深的貢獻。文化社會學家巴德(Baudrillard)著有社會學的歷史哲學。他以爲文化研究與歷史哲學同時產生，而又相互依倚的發展，有時社會學即等於歷史哲學，至少文化社會學可以說是建設於歷

史哲學之上。孫巴脫 (Sombart) 在所著社會學中，亦謂哲學的社會學，即同於歷史哲學。韋勃 (Weber) 並有歷史社會學的著述，足見哲學家社會學家均重視歷史，而以歷史為學問研究的出發點。

鮑亞史 (Bous) 為美國歷史民族學派的領袖。鮑氏 的最大貢獻為歷史觀點，而文化區域一概念，又為歷史觀點的具體表現。主張文化決定主義的克魯伯氏 (Kroeber)，亦以歷史現象有決定主義之不可避免性。他並以十八條宣言明文表明史學家的態度，於以建樹歷史民族學。克氏 以為歷史目的在研究文化全體而非研究人類；且視歷史為超個人的，超心理的，超生物的；歷史的研究方法，亦為自成一類的。他並以個人行為或團體行為，雖有本能的地理的基礎，但若不當做一種歷史的或文化的產物去研究，終不明其真髓。民族學家也視文化與歷史為一物異名，而以歷史為民族學的基本。溫德 (Wundt) 的民族心理學亦同此態度。

哲學家社會學家民族學家既均借重歷史，而以歷史爲研究學問的出發點，則我欲瞭解哲學社會學民族學，自非有歷史的學養不可。因此平常雖非專攻歷史，也就以歷史爲研究的重心了。上述各專家多以歷史的新見解，建樹哲學社會學民族學，而我則以哲學的社會學的民族學的見地，構成歷史的態度。觀點既別有所屬，則歷史的對象和研究方法，也就不能與衆盡同。

現在有許多史家對歷史多抱懷疑態度，不但對古代史的記載，多所懷疑，而別有所論列，別有所辯證；即對現代史的敘述，亦認爲不可靠性很多。這因歷史的記錄，不是將一切過去的事實，用攝影器或留聲機的方法客觀地忠實地記載下來。不然，歷史的敘述所費之時怕與歷史的實演所費之時相等。現在所謂「歷史上的事實」多經過了一度主觀的解釋、選擇、排列、潤色。這種依主觀造成的歷史，實在和小說相差無幾。這種與小說相類的歷史，也可信以爲真嗎！懷疑至於極端，則歷史根本被否認。從前的士子往往很素朴地相信歷史上的

事實他們以爲歷史上所記載的適如事實上所實演的，所以他們的口頭禪是「歷史這樣告訴我們。」這種唯史是信的態度，在學術研究上自有不少缺陷。經懷疑派的指摘、推敲、啓示，歷史上的事實，乃纔得了許多真實性，懷疑派的工作，在文化的貢獻上誠有不可埋沒的。

不過歷史上某特殊的斷片的個人或團體行動的記錄，容或有主觀的成分，而整個的系統的全宇宙全人類全社會以至全文化的敘述，終不能不說是客觀的實在，不容致疑。事實告訴我們，宇宙、人類、社會、文化之所以達於現階段，都不是突如其來，而有悠久的歷史的變遷。假如不信歷史的存在，即無異於不信現實的存在。因爲現實原是歷史的延長，要瞭解現實，不能不追溯歷史。

我的幼稚的淺薄的歷史觀，已如上述。這種歷史觀是否妥當？能否依據這歷史觀編述歷史？以及本著種種缺陷，均請海內賢達教正。至此書之撰述，得金兆梓先生教益甚多，除將拙著呈政外，並此誌謝。